

臧克家：“五七”路上如何“忆向阳”*

张磊

摘要：《忆向阳》是臧克家晚年创作的重要作品，因为记述了他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生活而倍受争议。本文将《忆向阳》视作一个标本，从乡土情结、感恩心态等方面论述作家创作组诗的心态。《忆向阳》并没有故意“美化”干校，它们确实是臧克家真情的自然流露。但是，缺乏反思的回忆，实际上只能暂时地排遣自己心灵的创痛。要想重塑生活的意义，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需要的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反思。

关键词：臧克家；《忆向阳》；乡土情结；感恩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136-04

从某种程度上说，旧体诗集《忆向阳》^①是臧克家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后最大的收获。1969年11月30日臧克家作为第二批学员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1972年10月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臧克家经常回忆起咸宁干校，通过两年的酝酿，1974年他开始写下了《忆向阳》组诗的第一首《夜闻雨声忆江南》。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截止到1975年4月，“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写出了50多首……最多的时候，一天写5首”^②。组诗完成后，臧克家曾打印数十份给朋友传看，获得了大量的好评。冯至还专门赋诗二首，并说“读《忆向阳》57首，深有同感，赋此二律，录呈克家同志指正”；张光年也作《采芝行》：“喜读向阳诗，戏作赠克家。”但是随着“文革”结束，组诗因为歌颂了“五七”干校，在出版时颇费周折，后来还是在张光年的肯定下才得以出版^③，这也为后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忆向阳》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对于干校劳动场景的正面反映，也有对于干校生活场景的间接描绘。劳动是干校生活最重要的内容，诗人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从插秧（《微雨插秧（二首）》）、割稻（《割稻》）、翻地（《月夜拖拉机翻地》）、打谷（《秋收夜战打谷场（二首）》）、挑粪（《挑粪灌园》），到最后的收获（《秋收大会战》、《板车拉粮》、《丰收，送粮入仓》）等，都历历在目。这些书写不但表现了劳动的喜悦，还把常人看来毫无诗意的生活描绘得引人入胜、栩栩如生。如《菜班》

诗句不仅对仗精妙，而且情趣盎然，充满了诗情画意：“自芟野草自开荒，亲手种菜亲口尝。阳春带雨剪嫩韭，夏日黄瓜尺半长。傅粉冬瓜似石滚，菜花引蝶入厨房。清晨荷锄雁行出，傍晚带月始回房。”

战友情也是《忆向阳》重点表现的内容。诗作有《喜逢干校战友》、《离别干校》、《展看干校照片三十幅》、《大风雪，收工暮归》、《秋收大忙，中午小休》、《晚收工》、《老黄牛》、《牛班》等等，臧克家在诗作中用朴实而深情的笔触，表现了那个动乱年代里知识分子之间，甚至是人与动物之间难得的情谊。比如《大风雪，收工暮归》表达了学员们不怕辛劳的乐观情怀：“归来天地尽混茫，带雪冲风入草房。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声声火爆交心响，阵阵喧呼快意扬。一日辛劳成大乐，战友围炉话棉粮”；《晚收工》是臧克家的“得意之作”：“秧田草岸竹屏风，叠翠遥笼晚照红。相约明朝齐早起，人同落日共收工。”他曾经说过：“这首诗非常好，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干校生活，胡绳同志也很欣赏。”^④而《老黄牛》中“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更是成为了“警句”，广为传诵。

有人指出：“臧克家的干校诗，是一种新型的

* 本文系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鄂南文化研究中心鄂南文化研究专项“归来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回归”（项目编号：zx1115）的成果之一。

田园诗，它既不同于古典的田园诗，也不同于现代的乡土诗。在《忆向阳》中，没有陶谢王孟的山水田园诗的静谧和冲淡，相反内蕴着革命年代的紧张和欢快的气息……臧克家的干校诗，是一种革命的田园诗。”^⑤也许正是这“革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它是特定时代对“五七”干校的赞扬。

文学作品发表后引起争议，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何况又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的大潮刚刚涌起的时候。但是后来对《忆向阳》一边倒的批评，甚至人为地将它从臧克家创作历程当中抹去，这就明显有失公道了。其实，《忆向阳》在文学史上应该是一个标本，它不仅见证了一个文学时代的更替，而且从“写真实”的角度来说，它还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文革”时期“遵命文学”的“先驱”。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作者创作这组诗的心态。

首先，臧克家推崇“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这组诗反映的确实是臧克家当时最真实的感受。下放“五七”干校的学员，因着各自的不同情况，有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及其流变过程，其中臧克家是有着明显的“感恩”心态的。我们知道，诗人在干校的生活除了初期有一点艰苦外，后来还是很受照顾，主要是做些看菜地、值夜班的工作，没有干重体力劳动，也没有陷入其他是非之中。他很怀念这段日子，“那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这不光是因为看菜地时，一人独坐，面对壮阔的大自然，可以浅唱微吟，一解胸中块垒；值夜班时，万籁俱寂，自由自在，主要的是可以和我交接班的光年同志对坐聊天，这在当时真是一大喜事”。从他叙述中的“浅唱微吟”、“自由自在”、“对坐聊天”、“一大喜事”可以看出，诗人当年在干校精神上基本没有什么负担，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更难得的是，诗人的身体也比原来好了很多：“说来也好笑，过去我有些多年求医问药都治不好的老毛病，到干校以后竟不治自愈了。以前每晚失眠，吃最厉害的安眠药照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可到了干校，每晚身子一沾床板便鼾声大作了。过去吃饭时，每顿吃得很少很精还常常消化不良，而在干校，每顿粗茶淡饭能吃上好几碗。去干校前，我是弱不禁风的病号，上二楼都要坐电梯，从干校回来，我倒步履轻捷，中气十足，越活越年轻了。我想，这恐怕是拜劳动所赐吧？”精神上日益放松，身体逐渐康健，心情自然也慢慢舒畅起来：“后两年干校的生活条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环境也稍有松动。那时同志之间的关系已不像过去那样壁垒森

严了，一些喜欢诗歌的同志常常在晚上到我的房间来谈诗论文，当然有时白天大批判时他们还要做一些表面文章的。这些同志过去虽同在作协工作，但因我不坐班，大部分从未接触过。三年的干校生活，使我们相互间建立了友谊。”^⑥劳动改变了他的身心，又收获了珍贵的友谊，那么，诗人肯定干校的劳动改造生活，赞美劳动，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他眼中的向阳湖充满了田园乐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可以从他离开向阳湖时的难舍难分看到他对于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感情。张光年在当年的日记里曾有过这样的记录：“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的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⑦崔道怡也回忆说：“老诗翁臧克家是较早获得‘解放’的一位著名人士，在宣布‘解放’他的大会上，他朗诵了自己的即兴篇章《我站在革命的行列》：‘一声解放，像春雷从头顶滚过，震得我心花怒放，震得我泪珠双落……在‘五七’道路上向阳湖畔的三年生活，我们把秧苗插满了阳春三月，我们也像一株株秧苗，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里生机勃勃……我决心在五七大道上永远走下去，为社会主义宏伟而光辉的事业略尽绵薄……’”^⑧所以，离开干校的时候，他“一声告别去，五内顿仓皇！依恋情深切，如同辞故乡。一步一滴泪，头低不能仰。啜泣不成声，欲语不成腔”（《离别干校》）。从张光年的日记里“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到崔道怡回忆里即兴朗诵，再到自己诗歌中“一步一滴泪”，向阳湖给诗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想来并不是他艺术上的虚构了。

也不是臧克家一个人对干校写诗进行“美化”。其实向阳湖给很多学员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同样有人在当时作诗描写过向阳湖的“诗情画意”，如：“湖上春常在，渠开水满畦。初阳话种谷，细雨透青泥。白发能持耒，书生健把犁。新秧随手绿，熟麦逐人齐”（韦君宜《向阳湖即事》）；“丹桂谁栽大合围，夹衢双阙势巍巍。轻车驰过争回首，金色凝眸香满衣”（王世襄《桂花树》）；“漫道还乡未是家，夜凉桐露共烹茶。碧天澄水四山静，妙语清谈到槿花”（顾学颀《干校杂咏》）。这些诗歌，无论从意境上还是语言上来说，都跟《忆向阳》很相似。由此可见，《忆向阳》并没有故意“美化”干校，它们确实是臧克家真情的自然流露。

其次，臧克家有着强烈的“乡土情结”，这也

反映到诗歌中，就是我们看到的“田园乐趣”。这一点从他被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时的感受就可见一斑。得到通知时，他的心情很平静，除了“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已使我心力交瘁，能早日摆脱这种折磨，换一换环境，对于我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下放到农村，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可能确是一种惩罚；而对于我这个‘不爱刺眼的霓虹灯’，只爱‘乡村里柳梢上挂着的月明’的‘乡下人’来说，却可以说是‘鱼儿归大海，鸟儿入深林’。当时，我甚至天真地想，后半辈子远离喧嚣的都市，归隐田园，做个现代陶渊明”。他想“做个现代陶渊明”，下放“五七”干校，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于是，繁重的干校生活在臧克家的眼里充满了诗意与浪漫，也就必然地会幻化成美好的抒情诗。

最后，诗人是通过回忆来创作《忆向阳》的。我们知道，心理学意义上的“回忆”，是记忆的纵向溯源，它是生活与美之间一个重要的心理流程，而这个流程正是美感和诗意产生的重要基础，通过“回忆”的“陌生化”效果，我们就能够将生活变成艺术典型。他的一首诗就描述了这个艺术过程：“窗外潇潇聆雨声，朦胧榻上睡难成。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灯花》）。诗人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不期而至的灵感又让这种回忆幻化成美好的艺术形象，即使是曾经的苦难，也被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色彩。

正是因为臧克家的“乡土情结”，使他对干校的农村生活产生了期待，而干校的“美好”生活又强化了他的这种情结，“感恩心态”再经过“回忆”这个特定视角的提炼，就产生了《忆向阳》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文本。

当然，上面的分析并不是要说《忆向阳》就没有问题。很显然，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文本，摆脱不了历史的羁绊。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就很坦诚地对此做过说明：“对《忆向阳》这本书如何评价？客观上诗本身是不错的。当时我们的觉悟程度没那么高，并没有觉得干校是极左。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但是她又说：“臧老一向认为：‘我是乡下人，生性爱乡村’，到了农村就如鱼得水。在咸宁的三年，他受益极大，有很多观感，所以这些诗并不是作出来的，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⑩所以，即便是多年以来，诗集饱受争议，甚至自己的老友姚雪垠公开指责说：“你的诗，请恕我直爽地说，是按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

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其中有些诗写作和发表在祖国历史最关键的日子里，曾经令广大读者深表遗憾和愤怒，也使爱你的老朋友感到痛心”，但臧克家从不后悔，因为“知识分子下农村锻炼，也有积极的一方面。当时我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那三年的岁月对我来说，感受大不一样呀！我现在每每念及那段日子，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姚雪垠的基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却忽略了作品创作的真实心态，再联系他前后“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是非标准，他似乎也难以摆脱历史的羁绊！

而臧克家“五七”干校的“校友”们倒是很认同他的诗歌。丁宁认为：“臧老的诗集《忆向阳》问世后，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把干校生活描写得那样美好，岂不是对‘四人帮’迫害的否定，对错误路线的歌颂！我却不以为然，那些诗篇，真实动人，读时，禁不住眼泪盈眶，那是老诗人亲身的经历，发之于内心的真挚之情。……诗人所赞美的是创造奇迹的神圣劳动，讴歌的是在艰苦环境中人的坚强意志、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对‘四人帮’的蔑视。说歌颂‘四人帮’，是荒谬的逻辑。”^⑪

记忆是复杂的，它有时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东西，即便是面对同一种事物或者过程，不同的人因为身份、处境、心理以及知识结构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记忆。而且，“幸存者记忆的个人微观史实具有很大的历史暧昧性。它是历史的，因为它基于个人的直接过去经历。但它又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它也许根本无法纳入宏观的历史规律、解释或叙述”^⑫。不管当事人过去经历和见证了什么，我们当下从中能发现的，或许就是一段叙述，一个故事，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忆向阳》正是这样一种处于意识形态边缘领域的“个人叙述”，它的许多细节也许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无须“政治正确”，也不是“正统历史”，完全没有必要说谎。但当我们把它放进“文革”叙事的文学潮流中，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同样也是被建构的结果，臧克家并不一定是按照记忆的“本来面目”全真地再现历史，而很有可能是“选择”一部分材料作为建构的语码，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复述并“修改”他过去的体验和经历，相应地，有些“不太合适”的事件或场景则被有意无意地模糊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本中，无论是忆人还是记事，都是在疏离了历史现场之后，诗人记忆的底片上呈现出来的温馨

的碎片。这些碎片有历史，有故事，有感情，当然很容易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获得更普遍意义上的认同。然而，在“文革”以及“五七干校”残酷的一面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大潮中被揭露出来时，那些“美好的记忆”就显得苍白了许多。臧克家之所以没有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弄潮儿，显然与他在“美好的记忆”之外缺少应有的反思有关。相比之下，另外一些“五七战士”对于“五七干校”的冷峻反思就因为显示了鲜明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而为人称道。

于是，当臧克家深情歌唱“大野茫茫场面光，重重麻袋列山岗。汽车得意驰如电，载得歌声入大仓”（《丰收，送粮入仓》）的时候，另外一位当事人陈白尘则在《云梦断忆》中对当年走的“五七道路”提出了批评：“因为我们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者，雨下得越大，干得越欢，才显出革命精神。有一天已经下雨了，正在收割麦子的人说：‘收工吧，不能收割了。’我们连长以无比豪情叫喊道：‘跟老天爷斗争到底！’麦子自然都割下了，但老天爷不买帐，一连下了三天雨，收到手的麦子都烂掉了！”“至于这些成就花了多少钱，那是只算革命帐，不该算经济帐的。我和侯金镜同志等都当过鸭馆，三人工资总数约四百元以上，加上饲料等等，则我们收获的那些可爱的大鸭蛋的成本，大约要高出市价五倍以上了！但这笔帐谁敢算呢？——那等于是反对走‘五七道路’！”“如今这儿除了残留着几处荷塘——而且又被我们这群‘农业专家’给毁了——此外，实在想象不出它烟波万顷如云如梦的丝毫景象来。……到处荒草丛生，却无一株树木。”^⑫张光年在告别向阳湖的时候，也在日记里记下来当时“怅然若失”的心情：“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带曾经是有山有水、竹林柳荫、杂花丛生、青皮红壤的小丘陵地带。原来农民生活并不富裕，但还过得去……可以在小河和塘水里捕鱼虾，在稻田里捕黄鳝，自家食用，多数家庭的鸡蛋也并不出卖……这一带还是药材之乡，松林下、树根旁，还可以采到名贵的灵芝，村民称之为红菇，药商时来收购。可是，当年在军宣队领导下围湖造田的壮举，却损害了这一带群众的衣食之源”。“我们这些天天念叨着‘为人民服务’的数千‘五七’战士，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辛辛苦苦几年间，走后留下的，就是把稻田变荒滩，把大湖变成牧场！”^⑬大走“五七道路”，盲目围湖造田，也许确实带来了“丰收”（也许更多是精神上的），但是对群众生活的损害，对大自然的破坏，并不能

因为算“政治帐”而消弭于无形！事实上，巴金《随想录》、萧乾《“文革”杂忆》、季羨林《牛棚杂忆》、孙犁《删去的文字》、杨绛《干校六记》等等，也都对当年的“五七”干校生活有很多的表现，或痛定思痛，决心自食，或淡看恩怨，记取温情。虽然经历不同，笔法各异，但是正视灾难，咀嚼耻辱，都体现出了人文知识分子宝贵的忧患精神及对后世的责任担当。比较之下，《忆向阳》的缺陷倒也是明显的。

《忆向阳》已经成为历史，是非自有历史的公论。当然，围绕着向阳湖“五七”干校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控诉”也好，“怀念”也罢，只能暂时地排遣自己心灵的创痛，它永远无法指引人们得到“彼岸”的幸福。要想重塑生活的意义，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需要的是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反思。这不仅是勇气，更是智慧的表现。也许只有我们都保持一种内心的警惕与谦卑，才能对历史作出恰当的评价，而这是需要依靠整个社会培育的宽容、理解、文明与民主体制保障下的人性提升的。

注释：

① 臧克家：《忆向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本文引诗未特别注明处皆选自该书。

② 臧克家：《高歌忆向阳》，《忆向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③ 详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④⑨ 参见李城外《九十依然忆向阳》，《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0页。

⑤ 李遇春：《臧克家旧体诗创作心理探源》，《长江学术》2009年第3期。

⑥ 臧克家：《咸宁干校散记》，《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⑦⑬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309页。

⑧ 崔道怡：《国庆中秋忆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⑩ 丁宁：《长忆向阳湖》，《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⑪ 徐贲：《“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⑫ 陈白尘：《云梦断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张磊，男，1973年生，湖北咸宁人，文学博士，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湖北咸宁，4371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